

京西煤业历史习俗

包世轩

一、元代大都时期的煤业开发和利用

京西泛指北京城西部的广阔地域，这里山峦起伏，林木丰秀，资源丰富。京西门头沟一带又盛产煤炭，从辽代就得到开发和利用。这已被辽代瓷窑遗址（本区龙泉雾村）的考古发现所证明。

元代门头沟的煤得到很大程度的开发和利用，对北京城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据《元一统志》记载：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所称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山，即指今门头沟区圈门一带。门头沟的煤在元代初期就得到开发和利用，这一史实证明，上溯到金代，金王朝时期，门头沟的采煤业也已有相当的发展。

元代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山设立煤窑场，管理大峪寺、马安山煤灰事宜，并课税奉太后位下。西山煤窑场设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二员，俱授徽正院札（《元史·百官志》卷五）。这段记载所说煤窑场之事，显然是指煤、灰生产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煤、灰课税之银两不会太少，否则是不可能奉太后位下的，从侧面可以看出其生产的兴盛状况。

另外早在设立“西山煤窑场”之前的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在大都城西南门平则门（今阜成门）就已设置窑场，设置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授从六品印；又在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在大都城的东北门光熙门设置了窑场，同样设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授从八品印（《元史·百官志》卷八十五）。这些窑场看来就是积存从门头沟一带运载而来的煤炭，供大都城内使用的。显然自至元十三年平则门窑场开设之后，因十几年的开采和煤炭的丰足，储纳发生困难，故才于至元二十五年新开设了光熙门窑场，从中可以想见煤炭开发的逐步发展情况。

元代末期著名学者熊自得（字梦祥）所著《析津志》中，对大都城用煤的运输情况有详细记述：“城中内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往来于北辛安及城下卖货，咸以驴马负荆筐入市，盖趁其时”。从中可以得知，元代大都城内外的经纪人初冬用牛车到门头沟一带的煤窑运煤。在城下，即城外是煤炭的集散地，煤在城外卸车，或许就运到各个窑场。然后从窑场分运转输，改用驴马负荆筐，把煤送往用户家中，用于冬季的取暖。这些记叙反映了元代煤炭运输集散的方式和过程，是研究元大都用煤情况的确切史料。

关于元代大都城内用煤的情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著名的游记中记载得更为

详尽：“整个契丹省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这种石块除非先将小块点燃，否则平时并不着火。若一旦着火，就会发出巨大的热量。

诚然这个国家并不缺乏木材。但是如此众多的人口，炉灶也多，而且燃烧不止，加上人们又勤于沐浴，这样必然造成木材数量供不应求。每个人一星期最少洗三次热水澡。每逢冬季，只要是力所能及，甚至一日一浴。凡身有职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备有一个火炉，以供自己取暖之用。象这样大量的燃料消耗，木材资源势难满足供应。然而这些黑色石块，却取之不尽，并且价格又十分低廉”。

这是马可·波罗元初（一二七五年——一二九二年）在元朝政府供职期间所观察到的、所记叙的用煤情况：不仅冬季取暖，而且还用于烧热水洗澡。当然炊爨之用就更不在话下了。显然大都城内的用煤数量及普及程度是相当可观了。当然这样大量使用煤炭的情况，只能限于官吏及富裕人家。但其消耗煤炭的数量绝不是个小的数目。

元代煤炭开采大致上也是秋冬季初春进行，夏季雨水到来前停止。京西旧俗，每年农历九月初一煤窑开采，来年五月初一停止。因夏季雨水大，窑内多被地下水浸淹。限于生产手段落后，积水不能清淘，故无法开采。另外由于夏季窑内易产生瓦斯气，民谚叫“瞎醒”，也是夏季停采的原因。《析津志》记载：二、三月后城中内外经纪人则不再运煤，而改为载草货卖，反映的正是这种历史情况。看来这种“冬采夏停”的煤业习俗，从元代至民国期间至少存在了六百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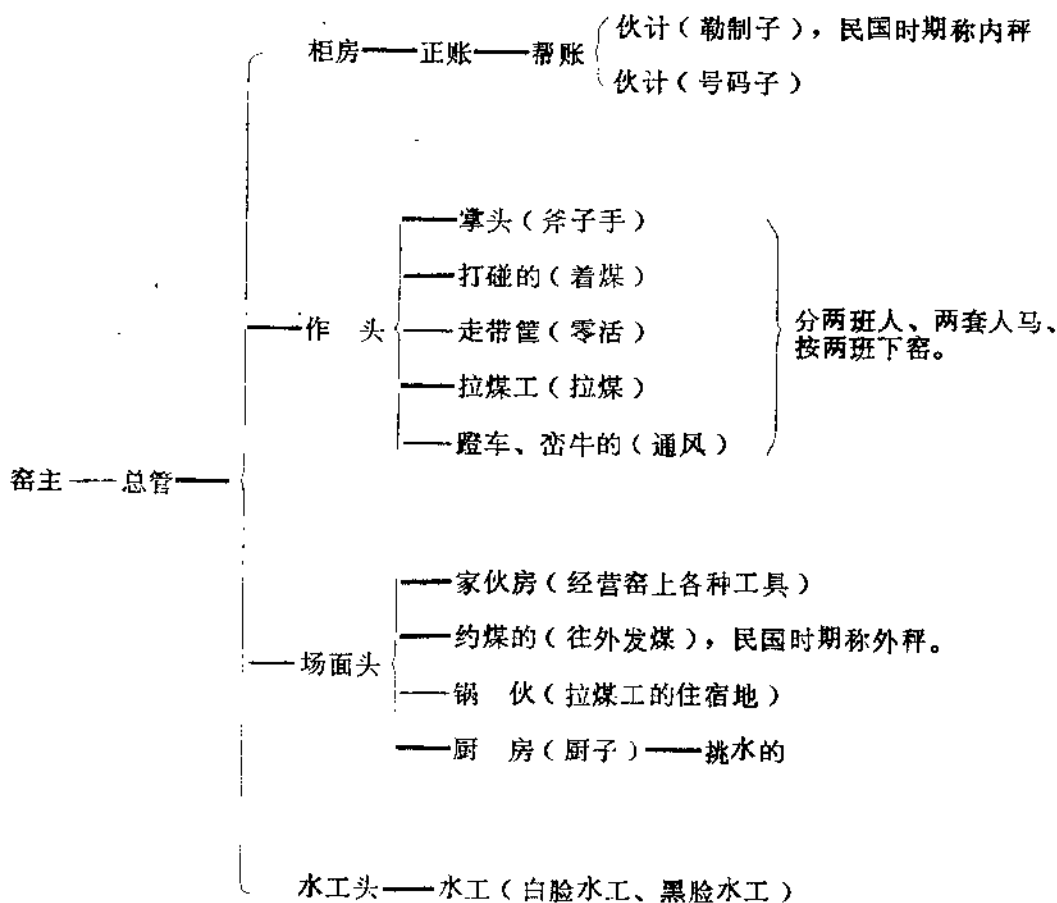
关于京西的煤，元代不仅近京之大谷山（今圈门一带）得到开采和利运，就是远达大都城以西二百里的斋堂地区，在元代煤炭也得到开发利用。

如元代著名学者熊自得（字梦祥），至正年间在京西深山的斋堂地区隐居，撰写《析津志》时，为抵御京西山区冬季的严寒，就仰仗本地的煤炭来取暖了。熊自得在大都城内的朋友欧阳玄、张翥与熊有诗文唱答。诗文中：“园蔬地美夏不燥，煤炭价贱冬常温”，“土床炕煖石窑炭，黍酒香注田家盆”的描述（《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六）。通过诗文的记叙，可以想见元代斋堂一带民间用煤的状况，同大都城内是一致的，而且这些价格低廉的煤炭，必定产自斋堂。这就是目前斋堂一带蓬勃发展的乡村煤窑开采煤炭历史上的先声。

熊自得这位祖籍江西的隐官在斋堂为渡过严冬，也是入乡随俗睡火炕。这种火炕，是在炕下用土坯盘砌烟道，在炕前地下砌一个地炉子，炉子与炕之烟道相通。炉上可以做饭，余热通过烟道把炕烧得暖暖的。这种烧煤的土炕至今在斋堂及京西的许多村镇还广泛存在，随处可见。这一现象证实，最晚在元代，京西深山区的煤炭开采也已经十分普遍。

二、清代煤窑的内部结构和分工

据访问一些八十余岁的老窑工得知，在清末的门头沟，他们经历的煤窑组织分工和煤窑内部结构是这样的。（如图表所示）



在民国二十年前门头沟基本都是“拉门”窑，“拉门”就是用一种拉煤床子，上缚荆筐，用力把煤拉出煤窑。民国二十年后逐渐改为背煤，没有几年就全部都改为背煤了，称为“背门”。

在门头沟众多的小煤窑上，在悠久的煤业开采历史中，有着独特而细密的劳动组织结构和分工。这是长期煤业生产而产生的分工，从中可以窥见煤业习俗的古老风貌。这些传承于民国时期的生产组织结构，不仅是清代煤业情况的记录，深刻地追溯起来，其历史将是十分悠久而古老的。现简述如下：

窑主：清代称窑主，民国称经理，是煤窑产权的所有者，他往往拥有相当的资本和权势，投资兴建煤窑，转而获取更大的利润，是最大的剥削者。一般都是京城内的官吏及财东。

总管：其是由窑主聘请的可以信赖并善于经营管理的人员，为窑主的代理人，平时窑上一切事务均由总管代为经解决。

作头：作头由比较精通地脉及煤炭蕴藏情况，并精晓窑下各种活计的实践经验丰富

的人担当。一般由总管代表窑主物色聘请。作头不仅生产技能高超，经验丰富，而且多是组织能力强，在本地窑工中有一定威望的人。作头都是门头沟本地人，不仅有技能，同时同本地人也熟悉。作头一般不下窑，多在窑下遇到难活或发生问题时才下去指导，在旧式小煤窑中是一切生产技术的通晓者，有如今天的工程技术人员。作头多是从有心计、具有多年丰富生产经验的窑工中产生。他们的一些绝活都是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因而普遍具有一定声威。有时一位有声望的作头，同时受聘于几个窑主名下，负责几座或更多的煤窑的技术活计等。

柜房：总管手下除作头外，还有账房，又称柜房。内设账房先生称正账，还有帮账，负责财务方面的事宜。帮账手下有伙计二人，一名负责“勒制子”，一名负责“号码子”，也就是检斤计数，把窑下运往场面的煤，按人头计算数量。在悠远的年代里，窑上采出的煤堆放在窑场里，称为场面。当时不用秤，而是用一种直径近一米的圆形荆条筐计算份量，称制子筐。一个制子筐五、六百斤或七、八百斤不等。伙计们让拉煤工把拉出的煤装入制子筐，然后计算重量，就叫“勒制子”。一筐称“一个”，四分之三筐称三角，三分之二筐称半个或两角，四分之一筐称一角。号制子时筐内的煤不能拍，如有拍的痕迹，拉煤工就不答应了。这是十分古远的检斤方式了。“号码子”的伙计负责写数，手拿一块长近尺、宽二寸的小木板，上扎一扎纸条，用墨笔写下×个×角的份量。拉煤工们拿这种纸条到柜房算银钱，柜房按条子上的记数付给工钱。民国时改为用大秤，又把他们称为“内秤”。

场面头：场面头负责窑场或窑场以外的一些事宜。他手下有约(yao)煤的数人，也是伙计。负责照管往外运输煤的，京西旧称“掌堆儿的”，拉骆驼、赶骡、赶驴的买主在柜房交了钱，由他们给检斤，再驮运走，民国时称为“外秤”。场面头手下还有“家伙”房。家伙即窑内外使用的各种工具。还有“锅伙”，就是拉煤工住宿用的半地穴式简陋的地窑棚，有伙计数人管理。有锅伙就有厨房，厨子一、二人。如吃饭住宿的人多，还有专门挑水的工人。住锅伙的是雇佣来的工人，他们每天有一亩煤自给窑上，小孩是半筐。说是烧煤钱，即窑口（拔道口）、或锅伙中点火炉子的用煤，实际上是一种剥削。

掌头：作头手下有一套人，一般都是他聘请的或信赖的人。掌头又称察掌，是带领窑工下窑的监工或领班。掌头专干支护棚架等技术活，也有称其为斧子手的。还有“打碰”的，就是刨煤的工人，在窑下煤巷中挥镐刨煤。有时“打碰”的刨煤工也带窑斧，干支护棚架的活路。支窑柱是个技术较强的活路，有时险情出现，随时有塌方落顶的危险时，斧子手几斧子就要砍成合适的窑柱支护上。故一般斧子手由掌头担任，同时也以他为主。软掌头是不行的，应付不了窑下复杂多样的地层情况。掌头升为作头是顺理成章之事。

走带筐：其是干煤窑上下的一些杂活。如在场面上修理破旧的窑筐等，有时也带窑斧，下窑帮助支护棚架等。民谚说：“好拉煤的，不如一个破带筐。”一般是作头的好友，挣钱较易。

拉煤工：拉煤工最多。煤窑出煤多少，除决定于煤层好坏外，就看拉煤工的能力

了。一般一筐二百多斤，从低矮的巷道中肩臂斜挎煤筐上的拉绳沿着地梭一步一步向上爬行。其状如蟹爬，把沉重的煤筐拉往窑口，是十分繁重的劳动。民谚曰：“一入拔道用目观，许多贵（跪）人在里边。骑马坐轿他不去，偏要拉车人驾辕。”这个工种的工人，多是怀来、涿鹿等县的外地人，受剥削最惨烈。清代多为自卖自身到窑上来的，住在低矮的锅伙里。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来年五月初一，如牛马般地劳动着，绝无自由可言，除了下窑拉煤，就是回锅伙睡觉，而且受到严密监视，以防逃跑。

煤窑上的各种人员，都有地域性传承的特点。圈门一带的村庄多出技术人员，如作头、掌头等。“外十三”村（永定乡一带）多出水工。门头沟圈门一带的本地人一般不干拉煤等繁重的活。

水工头：水工头是专门负责清淘窑下积水的水工们的头目。水工头一般与作头关系都熟，作头就把淘水事交水工头，由水工头再招募水工。水工多为“外十三”村的农民担当。尤以今永定乡栗园庄、小园一带村民居多，世守其业，形成垄断性质。水工亦有十分古远的历史及技艺传承。旧式煤窑科学不昌明，水工十分重要。

水工：水工以清淘窑下积水为业。斜下的煤窑巷道称为“拔道”。拔道地上铺状如木梯的木件称“地梭”。地梭的两边是坝坎，隔一段一个坝坎。坝坎是用木板钉成的方形水箱。一侧有坝坎的称“单打队”，两侧有坝坎的称“双打队”，一个坝坎一个人。根据窑内水的大小决定是双打队或单打队。水工们用柳条编的水斗子，把窑下的水通过一层层坝坎倒往窑外。每年秋后九月初一开窑时，水工最忙。因要把一夏天窑内的积水淘净，才能开采，俗称“拿荒水”。一斗水四十多斤，活计十分繁忙而沉重。

水工头在窑口的出水坝坎上，一边舀水，一边唱水工歌。歌声高亢悠扬，唱一百句为一双，大致上就是一百斗子水。水工淘够五百斗水才能稍微喘息一会儿。水工歌的功用除解除疲劳外，还用于计数，唱到一定段落就是五百斗了。水工头在窑口出水坝坎舀一百斗水，在窑下底坝坎的水工就得舀一百三、四十斗子水。水工歌唱词丰富，有宝贵的民间文学价值。

水工还分白脸水工、黑脸水工。白脸的只管在拔道中淘水。而黑脸水工除了在窑下最深处的水源处淘水外，还得在收工时拉上一筐煤。

每个坝坎处还预备几大块坝泥。坝泥用红粘土子加油活成，十分粘硬。由看场面的伙计用火通条把红土子砸碎再加上油活成硬泥坯，然后墩成方块，由拉煤工用窑筐带下去，放在坝坎上。如有木板制成的坝坎漏水，由水工们用这种坝泥把缝隙泥严。

蹬车、歪牛的：旧式煤窑通风用风筒，风筒用席子、荆条卷成。根据窑筒子的长度，一节一节一直到窑下煤巷里。长度称“度”（*tao*）（即人之双臂横伸展长度），有长至几百“度”的。窑外用老风车扇风，通过席筒把空气送往窑内。风车用木板制成，有的轮子上扎鸡毛，用脚蹬的飞转，称蹬车。风车直径有三种：三尺二、二尺八、二尺四。此外还有牛子，构造与风车近似，直径一尺六。蹬车、歪牛的工人把牛子口对准席筒扎紧，用手摇动扇风，把空气送往窑内。有一个木件称“大眼哥”，是摇牛子用的。所谓歪牛，就是摇小风车，即牛子。歪就是摇的意思，北京方言“紧歪”，大概就是源于此类性质的工作而产生的。

记账的方法：除“勒制子”、“号码子”的记数方法外，也有用大秤的（大秤的发明年代没研究，但最迟清末是有的）。账房伙计们计数字用一种独特的写法：

1、二、三、×、8、上、十、主、久、拾，

即：1、2、3、4、5、6、7、8、9、10。

记账有大账和小账之分。大账有名布、簿子、用分、头工等门类。小账则有放应、放水、放活、放空等名目。

每座小窑的下窑人一般分两班，有两套人马。大约早六点上工，晚六点半下工。另一拨晚六点上工，早六点半下工。他们使用一套生产工具，每半月（初一、十五）轮换，换班时要给窑神上一次香。

三、清代煤业生产工具及工艺传承

京西煤业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广泛使用着一些独特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最能证明本地煤业的历史和工艺传承。对于清代以丰镇煤业生产工具及生产技艺的研究和探讨这一科学研究工作不被人们所重视，或者知之者甚少，更增加了这项工作的可贵性。缺少了这一环，对煤业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遗憾。笔者从事文物工作，近年就就此做了一些探讨。主要记叙清代的生产工具。

清代煤业使用的生产工具，各地因地层、生产习惯、材料等不同，因而各种工具及生产技艺不尽相同，有着地区的差异。

门头沟一带煤窑使用的生产工具如下：

锤、楔、镐、撬，是铁工具，广泛使用窑下。

窑斧：其一边为细长斧身，有锋利的斧刃，一边为羊角状。窑斧用于砍窑柱的“坡头”和钉砸等。民国后期的窑斧出现了另一种形制，即羊角状一头打制成小窄条稿样，称“抄子”斧。

窑灯：清代时窑灯用锡铸成，如小葫芦状，有一个长长的灯嘴子，添上油共一斤半重。灯上有小孔插小铁镊子，夹“灯捻”用，京西称窑灯捻儿为“布离”。民国中期出现铁皮的窑灯，形制与锡灯相同，只是重量轻得多，窑工们很爱用。这种锡灯或铁皮窑灯，又称“灯壶子”，用一根布条穿过套在头上。民国后期出现铁皮电石灯，日本时期又出现了小巧一些的铜皮电石灯。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窑灯的明显演变过程。

拉煤床子：清代煤窑的煤都是从窑下拉出来的。拉煤床子的制作是用两根木条制成床子木架，木架下施用铁条；床子前部后部各有一块厚木板，用几根铁条把木架和木板固定，就是拉煤床子。拉煤床子前部有一个孔，用于扎系拉绳。拉绳用铅笔粗细的细麻绳八股并排穿编而成，再用木楔和小孔楔牢，称八股套坯儿。拉绳另一端系成绳套称搭肩儿，套在肩头拉煤。八股套坯儿的长度一般约从脚跟到拉煤工的耳朵尖。否则拉起来，长了摆，不好控制；短了啃后脚跟，活活受罪。拉煤床上用的铁活称“螭螭儿”，把煤筐别在上面。

拉煤筐：用从山上割下来的荆条编制的工具种类很多，如拉煤筐、杏子、提溜、制

子筐、篓子等。拉煤筐更具工艺传承，我区只有妙峰山乡阮驾庄人会编。拉煤筐主要有两种尺寸，形制相仿。一种称为“紧八径”，筐长一点五尺；另一种称为“慢八径”，比“紧八径”筐长一寸。煤筐历经的编制程序是：打底（分摆径、搭径、插、领条、回脑瓜门、回五花头），拢上（把径条用一条麻绳分五络拢上，形成筐的外形，称拢绳），另外还有打转、上偏遭、下正遭、拉沿儿（按沿儿、博沿儿、搁沿儿）。这种拉煤筐编好后是长方形，在窑场还要经过蹬筐工序处理。蹬筐是用火烘烤，穿上逛条，把筐蹬成长圆形。逛条就是筐四周穿插上粗些的荆条，以增加筐的强度，不怕磨碰；同时用逛条也可保持住筐的外形。有术语形容逛条，叫前三后二五，即筐两侧前部别三根逛条，后部别两根，共五根的意思。另外筐的前部也是横别三根，尾部横别两根逛条。蹬好的筐上还要系上几条绳索。有尾巴绳，粗如食指，长一丈八尺；还有绊绳，只有二尺长。绊绳的两端拴在筐的前部，尾巴绳与它绊扣。煤筐使用时筐上四周要插上插垫，以增加筐的高度，筐的上边还要再盖一块插垫，防止煤洒了。插垫为圆形，状如荆条筐的盖儿。插垫有的人用五块，有的人用六块。因为插上插垫后筐的高度增加，所以便可以多装煤，一般一筐能装二百余斤。

荆条编的工具还有端煤用的忒子，忒子两侧有两个把儿。提溜没有两个把儿，是在极薄的煤层里，装上煤往巷道里拉的。提溜一边一根绳，空筐拉进煤层（煤层有时只有几十公分厚），装满后，外面的人再拉出来，往拉煤筐里装。这种工具叫提溜。

制子筐：圆形，用粗荆条编制而成，直径三尺，高三尺。场面上号制子用，一筐煤七、八百斤。民国二十年左右改背煤时，也是用荆条编的器具，称篓子，同样是阮驾庄村编的。

斜弧、地棱、戳窝儿：斜弧即指巷道，也就是京西窑工所说的拔道。在拔道的斜形坡道上，用粗木柱等距离地卡上，形成一个用横木柱铺成的坡道，每根木柱叫地棱棒子。拉煤就是摸着地棱棒子，臂挎绳套，历尽艰辛地把装满煤的床子往窑外拉。四肢用力如同蟹爬，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斜长的拔道中的地棱上，有戳窝儿，即下边木柱比稍上边的木柱高出几分，往上拉煤时能感觉出来。一旦精疲力竭，感到戳窝儿的动静时，把拉煤床子搭在戳窝儿处，可以稍微喘上口气，歇上瞬间。

窑衣、抽帽、刮汗板：旧时钻窑的工人是不穿衣服和鞋的，有的穿一件千缝百绽厚厚的破坎肩，就是窑衣。抽帽，即用布缝个筒，上边用线抽拢扎紧，戴在头顶当帽子用，防止灯套磨脑袋。在抽帽下插一根骨头磨成的窄长骨片，就是刮汗板，拉煤时汗如雨下，用手抹脏又不方便，用刮汗板把汗珠儿刮掉，随即又插在额头上。

工艺传承方面：京西煤业的内涵十分丰富。由于千百年来 的实践，京西窑工对本地的地质情况甚为了解。窑工们称门头沟的煤有十三匣，即有十三层。据现年八十四岁，走了六、七十年窑的老作头孙永春介绍，门头沟的十三匣煤自上而下是：①青煤匣、②紫煤匣、③二匣子、④小黑煤匣、⑤黑煤大匣、⑥腰石匣、⑦明煤匣、⑧小白煤匣、⑨上中匣、⑩下中匣、⑪扫帚匣、⑫青煤二匣、⑬青煤大巷。关于这十三匣煤的说法，老窑工们也有轻微的差异。关于“匣”，有念“弦”音的，也有念“弦儿”音的。

门头沟圈门一带的煤基本是与地平面平行状蕴藏的，称为“朴煤”。而立式蕴藏的

煤则称为“槽煤”，多在斋堂或大台沟一带。而因地层的变化，门头沟的煤也有倾斜蕴藏的情况，窑工们称为“半槽丰朴”，也有称为“侧（音斋）楞朴”的。这是民间给予的独特称谓。旧时代煤窑口的第一对窑柱和梁，一定要用枣木和杏木结合使用，取其“早兴”谐音，有盼望早早兴旺的寓意在内。

而这种朴煤、槽煤煤层，开采时要使用窑柱搭棚架等。行话叫：撑、柱、封、盘。撑有立撑、卧撑之分。窑柱有多种使用方式和工艺，有官帽柱、炮仗台、银顶灯、大口柱、小口柱、腐腿柱、扎帮柱等名目，随地层形势而使用。棚即是指窑内的棚架，是用立柱和横木搭成的。盘指煤层中的窑柱及棚架的做法，行话叫“掌盘换柱”。盘有单道盘和双道盘之区分。旧时代这些独特的工艺技术都掌握在作头和掌头的手里，不是亲朋好友和至交，这些技术是不轻易传授给外人的。

门头沟的煤因有十三层，所以民间给予的称呼也是丰富的，不仅仅是一个黑字能概括的。如：有黑煤、白煤、红煤之称呼，从色泽上不难区别。这些煤又有不同的用处。如一种“野鸡脖煤”，煤质坚硬、泛着五彩光泽，多用于炼制金银；又有一种“碴子煤”，亦十分坚硬、火力极旺，用于铁匠作坊，锻打钢铁用；有的饭馆做饭用，有的灰窑烧石灰好；还有的是纸铺用来薰纸好，薰出的纸洁白无比。清代京城百业作坊用煤都是有特殊要求的，在门头沟一带都能满足他们的使用要求。

四、窑神的几种形像

百业皆有祖师，门头沟煤业也有祖师，就是窑神，也有称为窑王爷的。目前在门头沟一共发现四种风格的窑神形像。关于窑神，门头沟盛产煤炭的许多地方的庙宇里都有供奉。可以说是古老煤业信仰的产物，因而有着可贵的研究价值。

门头沟有专祀窑神的庙宇，就是圈门地区的窑神庙。殿宇两层，配殿十六间。据说庙内的窑神是黑脸，胡须浓重，头戴官帽，身穿黄袍。此其一。

其二，京西民间多贴一种“神马子”窑神，其是用木板雕刻成印模，用纸墨印成。这种神马题为“煤窑之神”。此神头顶隆起，双目圆瞪，肩披络络，面目颇凶猛。像下半部有驮运煤炭的人及牲畜，神马子多是城内纸店为门头沟窑工预备的。

其三，门头沟区木城涧的禅房村有秀峰庵古庙，创建于明嘉靖，清代历经重修。据寺内光绪九年碑记载，寺内关帝殿，中供关帝，左壁绘窑神，右壁绘马王。这幅壁画窑神画面高一点四米，宽二点五米。这位窑神坐交椅上，头戴软冠巾，脸呈黑褐色，黑须如猬，口微启，头罩神光圈；右手持钢鞭一条，左手扶膝；身披铠甲，内着黑袍，黑袍镶以红边；一腿置椅下龛台上，一腿微前伸置龛台边，足蹬黑皂袍，一身勇武气魄。窑神左有侍童二个，一女童手捧似灯盏之物，一男童手捧物已剥落，不可知晓；右有二童子，外首一位手托黑漆盘，上有一瓶，瓶造型如玉壶春样，似是酒瓶；里首童子，雨浸渤，故形像极为模糊。

其四，千军台、庄户村古幡旗中，有“山川地库煤窑之神”幡旗。幡旗上有窑神形像。此像头戴盔、身披甲冑。右手持开山斧一把，高举过头，左手提着一串钢钱。衣带飞舞，身后飘祥云几缕，姿态雄浑。尽管是后来补绘的，但是从形态上看也是坐式，然

而没有画上椅子。据村民讲，这条幡旗是清代本地一个富户开窑发财，发愿置办，后加入幡旗行列的。

关于窑神，我区有几块石碑上都有相关的记载。而从文献上看，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的记载。目前发现的碑文记载最早的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碑是《大寒岭毗卢寺添建文昌阁碑记》，碑称：“……道光四年告成，寺中添建文昌阁……其余移修三圣殿、茶棚、立窑神庙，建修山神庙……。”

道光甲午年（即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峰口庵碑记》中记载：“岭西之峰口庵者，苍嵩叠翠，带麓河山。乃都门之右屏，西口之要道。……左环右迴、层崖耸翠、万山巍峨、威灵显赫在其上。我卑民祈明王佑畜以平安，愿窑神赐乌金而兴宝藏，赖财神量德以增福……。”

这是关于窑神供奉情况的一些记载，但都是道光年间的。惟圈门窑神庙光绪七年《煤行公议碑》记载，庙曾于嘉庆元年重修过，但当时是否叫窑神？是否供奉窑神？还有待考证。但从种种迹象分析，窑神之祀，不会晚于乾隆年间。

关于供奉窑神的庙宇还有木城涧的玉皇庙、永定乡王村的月严寺等。

五、祭窑神的习俗

门头沟悠久的煤业，产生了与煤业息息相关的风俗和习惯。因为采煤，窑主乞望窑神佑护多出煤，发大财；窑工们则希望得到窑神关照，不塌方落顶，平安无事，养家活口。因而门头沟历史上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节日——腊月十七祭窑神。这是发自煤业各界人众心底的祭祀。朔风凛冽、白雪皑皑，京西山野大大小小的煤窑都要隆重祭典。当日清晨，无数的鞭炮炸响成震耳的声浪，每座小煤窑都要在窑台上贴上“神马”（即窑神像），神马两旁贴对子，上写“乌金墨玉”、“石火观恒”等吉语。窑口摆上八仙桌，燃点香烛，摆放供品。有整猪、整鸡，猪头朝外趴放于桌上大木盘内，唯脊背上留一撮鬃毛不刮，编成小辫，上插红色纸花，人们争相膜拜煤业的祖师——窑神爷，盛况较春节还要热闹。祭祀的当天，有钱的窑主请窑上的伙计以及各界人士在窑上喝酒吃饭。什么拉骆驼的、赶驴骡驮煤的、唱喜歌的叫化子，都可以入席，大块的肉，大碗的酒，香飘山野，很有些慷慨豪放的气派！

前来给窑上念喜歌的讨饭人，大都是口齿伶俐的民间艺人。若唱得窑主高了兴，则大把的铜钱往外掏；若遇到吝啬的窑主，也能唱得他们背过了气。好听的恭贺发财的诨称之为“念喜”，反之则称为“念窑丧”，给窑主添点晦气。“一入窑场白不花化，不出好煤净出石渣。进去十二个砸死了仨，仨抬的、仨埋的、还有仨起不来的……。”这首便是窑丧词。另外还有“吹喜”的，所谓吹喜就是小乐队。乐器有笙、管、笛、唢呐、云锣等，演奏几段宗教的或喜庆的民间乐曲，也是给窑上贺喜的一种形式。门头沟圈门一带小窑多，一天转下来，这些各色贺喜的人们的腰包差不多也装满了。

京西古老煤业的文物古迹较多，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圈门一带的窑神庙、门头口过街楼以及窑神庙南边的大戏楼，这几处文物都是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需要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

窑神庙的西院旧有庙宇数十间，是清代宛平县县丞办事的衙门。窑神庙南是一座西向的高大精良的大戏楼，是每年腊月十七祭窑神“恭庆窑神，同行演戏”用的。大戏楼分为前、后台共六间，为勾连搭式古建筑，创建于明代，从形制上看明代的风格很明显。台口上方巨大的横梁与立柱相交处，嵌巨形透雕云龙木构件，显得生动飞舞，与演出功用既一致又十分和谐。戏楼后台梁下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的黑漆金字大匾仍完整地悬挂着，上有斗大金字“歌舞升平”，熠熠闪光。这座戏楼每年祭祀窑神时为窑神唱三天戏。

清代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来年五月初一是采煤的良好时机，过了五月就是雨季，窑下水大，就不能再开采了。每年五月十三就完全停工，称为“了窑”。此时也要举行停工的仪式，在大戏楼唱三天戏。因五月十三是窑工“下山”的日子，俗称“全甲屋子”（锅伙）散伙的时间。这一天拉煤工在窑上欠的钱不管多少，都算免了。住窑锅伙拼命干了八个月活的窑工，到了这一天就得到解脱，所以是个喜庆的日子。这个习俗不复存在已有六十余年了。民国时改为四月十八、十九、二十唱三天戏，这是一个有趣的演变。

但是腊月十七祭窑神的习俗保留的时间要长一些，直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取消小煤窑为止。

这种独特的煤业祭窑神习俗，反映在讨饭人的“喜歌”中、秧歌会的歌词里、古幡会的旗帜上、庙堂威严的雕塑和绘画间，是一份极为丰厚的历史学、民俗学遗产。据了解，全国煤业历史悠久的地区都祭祀窑神，但都是腊月十八。而门头沟却比全国各地都早一天，原因何在呢？大概是地处天下第一县——宛平县的缘故吧！或许是门头沟的煤直接为京城皇族使用，本地的窑神爷也就受到特殊的恩典，提前一天享受人间的烟火供奉吧！就是与门头沟毗邻的房山县长沟峪、周口店一带的煤窑，也只能腊月十八才开祭。天下之事，就是这样严格有序，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呀！

六、煤业的歌谣和唱词

今将几年来陆续收集的几十首歌谣唱词，选刊几段，以窥风貌一斑。

水 工 歌

陈 祥

张飞呀出马呀一呀条枪，
二郎爷担山赶过太阳，
三度林英是韩湘子呀，
四弟赵云保过皇娘，
五郎怕死躲到了高山上，
把守着三关是杨六郎，

乱箭攒死是杨七舍，
北国的驸马是杨八郎，
八姐九姐本是亲姐俩呀，
二姑娘的花鞋两五双。

.....

开 券 喜 歌

陈 祥

（开券又称“破门”，即刚开挖煤窑时的仪式。）

一入窑场观四方，
座北朝南细端详。
开采、烧香、破土，正在朴口上，
作头的心力、眼力、能力、名誉，
如同浩月照八方，
开窑的洪福齐天盖世双。
真是金梁配玉柱，
举动人心，开窑如同立下的粥场就当香。
天开仓，地开库，地巧人拙神引路。
垫窑场，盖柜房，
头券就在今晚上。
侧（音斋，zhai）楞朴透槽根，

槽拉的、朴拉的两下分。
北大槽爬坡上山，顺槽起棚道。
朴里头，东道、西道、正南几条道。
三岔口，四牌楼，
头指正东无有拦挡，
四身西头投了顺槽。
百丈厚的中心楼怀中抱，
托的券底永远不能落（lao）。
黑煤不嘭，
白煤不爆，
哪家的交界也挨不着。

窑

陈 祥

一入窑场抬头观，
观见三座好宝山。
左金山、右银山，
当中一座好煤山。
官房儿盖得好比金銮殿，
拔道如同佛爷龛。
龛里头供着神三位，
山神、土地，窑神在中间。
诸位要想认识祖师相，
顶灯、挂镐，倒提着一串钱。
窑里使着千把镐，
窑外放着万把锨。
灯也亮，水也干，
淘水的水工永不见，
蹬车、套牛的使劲地把风掭。
教我们念喜来要饭，
东西庄家家串，
肚子里无食冻得直打颤。
不管它打颤不打颤，

喜

先给这宝号送吉言。
有顺槽，有上山，
大小朴随便添，
不冷不热掌也干。
块子掌来的顺，
掌头着煤也省劲。
弧也平道也高，
背煤的顺劲不猫腰。
中心撑，大地硬。
恰恰顶，根脚深，
作头一见更省心。
买卖快、骆驼驮、大车拽。
硬蹄的牲口怕它碾场不爱卖。
官房门前立着我的八杆秤，
八个约，八个号。
看“堆儿”（zui）的先生不敢离拔道。
总管的先生着了急，
先研墨，后提笔，
拉骆驼、赶车的算账往里挤。

收了钱，开联单。
跑出柜房一溜烟。
“大头”三点把“起儿”叫，
九点多钟才睡觉。
三、九点一天半，
拉骆驼、赶车的算账拥不断。
一个月，三旬头，
挣下的银钱雇脚找骆驼。
上磅约，多少吨，
开窑的先生一见喜在了心。
喜在心，开了恩，

窑

陈 祥

一进窑场寒了心，
黄蒿长得几丈深。
几丈深拔不掉，
总管、先生急得上了吊。
众伙计，受了煤气，
一个一个的喂老耗。
堵窑脖子塌拔道，
稀拉哗拉的往下抛（pao）。
臭带筐正睡觉，
当掌头的不知道。
拉煤的一见事不好，
交界眼儿往外跑。
掌头一见发了蒙，
工夫一大歇了灯。
歇了灯没了招儿，
一步一步往外摸（mao）。
一下摸到大弧根，
大弧根找拔道，
稀里哗拉往下抛。
作头一见发了蒙，
这几条人命算白扔。
臭带筐吓得直打颤，
哭哭啼啼开了言：
这一回孩子娘儿们看不见。

立下粥场济儿孙。
作高官，中状元，
天子的贵客他把蟒袍穿。
穿朝靴，戴亮红，
天子贵客第一人。
十字披红插金花，
玉牒衣前放光华。
考了官、回了家，
这一回，
开窑的、总管、先生永远把财发。

丧

作头说，别着忙，
扶首撑，摸碴墙。
哪知道滑不积连（lian），
哧溜扑咚一块儿掉进大水塘。
家伙房好比棺材铺，
柜房好比停灵宫。
一场设坛四棚，
姑子、喇嘛、老道、僧。
搭衣上坐，伴吹伴打的笛、簫、笙。
取水送竖“趟趟”（乐器）经。
渡桥送寿四门分着雌雄。
披麻戴孝新丧有几个，
经理、总管、大头带着先生。
孙子辈儿的徒弟两三个，
孝帽子之上戴红棱。
内侄儿拔道会掌磅，
看大堆儿（zui）是他干外甥。
个个身穿是重孝，
全凭那红蓝布条分出宾主与雌雄。
虽然不是亲骨肉，
个个哭得是两眼红。
拉帮套的儿子哭了半天没听清，
还在后尾（yi）瞎哼哼。
……

门头沟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历史发展概况

周桂荣 整理

门头沟区供销合作联合社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它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为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保障军需民用,由民办公助而诞生的;它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环境的考验;解放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抗日战争时期的县供销合作社,是在区、村建立合作社的基础上,于一九四三年六月成立了“宛平县联合社”。而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经历了“宛平县生产推进社”、“宛平县供销合作社”、“京西矿区分社”、“门头沟区供销合作社”、“门头沟区商业局”、“门头沟区供销合作联合社”等多次机构变更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又从中划分出信贷、手工业生产、粮食、服务、食品、外贸等部分业务,成立了专营部门。

近五十年来,供销合作社无论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它具有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它为城乡物资的交流发挥了很大作用。

现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以后三个阶段,分别介绍如下:

一、抗日战争时期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一)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党在东斋堂村成立了宛平县人民政府。为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奸商剥削,县委在马栏村办了七天干部培训班,要求各村干部组织群众办合作社,县政府建立了实业科负责合作社的组建工作。广大村干部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宣传合作社的好处,发动群众入股集资加入合作社。当时宛平县人民政府辖区主要为现青白口以里地区(四〇年后又包括除向阳口以外的现沿河城乡范围及怀来县的水峪口、横岭、瓦窑、旧庄窝一带)。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十个自然村办起了合作社。当时办的比较好的合作社有付家台、桑峪、西斋堂村、大安山七村联社等。如桑峪村张守孟同志与杨文林、张全禄等人,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入股,不少群众把小米、玉米、杏仁等农副产品作为股金,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个股(每股折合一块钱),又从县政府借了一千元边区票,以此作为资金办起了村合作社。合作社的主要工作是收购当地的农副产品,换回根据地十分缺乏的食盐、土布、黄酱、针头线脑等生活必需品,供给群众。又如一九三九年春,区公所派赵连级、王德印两人组建了西斋堂村合作社。每股股金一至两元钱(入农副产品折价计算),又从县政府借了捌百元边区票作为资金,经营面粉、食盐、土布等商品,三个月后有了盈利,扩大了业务,还给社员分了一次红。再如一九三八年,杨德堂、王喜朝等

人在地处交通要道的大安山成立了一个七村联社，有七间房做铺面。其主要任务是：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根据地和敌占区的物资交流。全县大部分地区收购的核桃、杏仁、药材等土特产品都是通过这里卖出去，换回食盐、布匹、纸张、小百货等生活用品，以解决物资奇缺的困难。当时敌人对食盐封锁得特别严，如抓住向根据地运盐的人，就加重处理，甚至杀害。但是大安山七村联社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运回了不少食盐，当时库存食盐达二、三万斤，解决了军需民用。由于大安山七村联社工作成绩突出，于一九三九年奉命改为“宛平县贸易局”。

（二）一九四〇年，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疯狂地进行大扫荡，其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沿斋堂川的村庄都建立了据点，迫使人民到深山沟整中去避难。但是不少合作社的同志们面对敌人的扫荡，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大安山联社的同志把商品转移到西苑村和南杏儿山沟，西斋堂村合作社赵连级等同志把商品藏到皇城峪一个窑洞里，把账本和现金由三人分散带走，后将其全部交还县政府；桑峪村合作社张守孟等三同志把商品用背篓背到山上，为逃难的群众送货。为了送货，有时要走三、五里路，直到把全部货物卖完，合作社才暂停业。

当时的供销合作社，虽然遭到了敌人的摧残，但是并没有夭折，而是紧密配合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新形势下采取了游击活动的售货方式：敌人来扫荡，就坚壁清野；敌人退走了，则照常工作。

敌人占领根据地的部分村庄后，人民生活更加艰苦。如何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这是当时极为迫切的议题。为此，平西专署在涑水峪渡召开了六天的合作社工作会议，学习了合作社社章，并要求各村克服重重困难，想办法把合作社继续办下去。斋堂川北沟办事处（办事处是区合作社工作机构）主任曹玉信同志参加了会议，回村后及时召集办事处成员到秘密碰头地点——柏峪火石崖，研究合作社的组织发展工作如何进行。然后，他们分头行动，深入各村召开干部、群众会，宣传办合作社的好处，学习社章，说明“组织合作社是为了改善民生、推销群众剩余品，互利劳动、低利借贷，合作社不为取利，只为在敌人掠夺、物资奇缺、生活困难的条件下解决群众生活需要；而且入股、退股自由，入股额不限”等等。按社章规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由入股社员选举产生。一般每个村选三个人，一个主任、一个会计、一个委员；大村也可以选五个人。选出的人员在合作社义务工作，并且，每年改选一次，工作好的可以连选连任。经过组织发动之后，干部带头，广大群众纷纷加入合作社。故在很短的时间内，燕家台、梁家主、黄岭西、天河水等二十多个村都先后恢复或成立了合作社。

天河水村离敌人据点较远，党领导群众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换工队”，负责开展生产互助；另一个是合作社，负责经营购销业务。合作社的工作由刘天明、张玉珠、杨永瑞等人负责。他们翻山越岭，到五、六十里路以外的宛平县办的“芦子水商店”（现属房山县）、“龙门沟商店”（在沿河城乡的大山上）赊购食盐、粗布、火柴等货物，驮运回天河水后，藏在一个土山洞里，把洞口封死，以防止敌人偷袭。然后他们把商品分别赊销给附近的双塘涧、张家庄、洪水口、段台梁等九个村负责合作社工作的干部，卖完了货再付款，解决了群众生活必须品的困难。

一九四三年人民除了承受日寇的扫荡外，还遇到了罕见的大旱，不少人到张家口等地逃荒要饭，有的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天河水地区没有外出逃难的，没有饿死人，合作社为帮助人民群众渡过灾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至今，当地群众还记得四十多年前合作社存货的山洞和临时卖货的草铺旧址，传颂着合作社的同志们为人民群众勤奋工作的佳话。这个合作社经营的利润，百分之六十给群众分红，百分之三十做公积金，百分之五做公益金，百分之五做酬劳金。刘天明的酬劳金约三十斤小米。这个合作社由四二年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机构变动时退了社员的股金而告结束。

供销合作社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坚持工作的，虽然资金奇缺，工作艰苦，待遇微薄，但大家有一股抗日救国的决心，依靠广大群众办社。因此，尽管其建立时间很短，制度不完善，机构不健全，但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一九四三年六月，根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三分之一以上自然村建立了合作社的区可以建立区联社（本县叫办事处），有三个区联社以上的县可以建立县联社”的规定，宛平县不少村庄已经成立了医药、烧炭、挖煤、收售及综合经营等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宛平县联社。社址设在四区秋林铺（现属房山县）西北头的麻黄，并在曹家房村召开了县联社成立会，区办事处的干部参加了会议。由宋怀儒同志任联社主任，杨国文同志任业务部长和会计，麻黄药社的韩晓峰、任成业、任成瑞三同志除收售、加工药材外，帮助县联社工作。为作好会计工作，杨国文曾专门到涞水峪渡学了五天“复式簿记法”，并带回四万元贷款作为活动基金。县联社的任务是：继续组建区办事处，帮助区办事处建立村合作社；组织农民开展家庭副业，实行生产自救；开展购销业务，负责大宗商品运销；代替银行开展信贷业务，低利贷款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所缺资金。随着工作的开展，县联社机关人员不断充实，机构逐步健全。一九四五年宋怀儒调出，杨国文任县联社主任，“社务股”股长刘永武，“业务股”股长依次为李春芳、王振远、王喜朝，“会计股”股长依次为吕光印、王喜仁，“总务股”股长为杜连生。

第一区至第五区成立了办事处。一区（斋堂至齐家庄西北沟一带）办事处主任依次为李春芳、韩巨禹、曹玉信、杜连生；二区（煤窝四村、火村、宝抵洼、元港、西苑村等地）办事处主任依次为李建、吕光印、王振远、马玉才；三区（塔河、黄安、张家铺、马家铺、黄塔等地）办事处主任为马永立；四区（秋林铺、莲花庵、史家营、金鸡台、柳林水、鸳鸯水、三青台等地）办事处主任依次为王喜朝、王喜仁、刘永武、杨德安；五区（大台、千金台、窄石台一带）办事处主任为杨兴增。

县联社与区办事处的干部共计四、五十人。他们和政府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吃公粮；每人每月发三至四元边区票为菜金；粮食困难时开荒种地，每个干部还要上缴三、五十斤公粮。县联社的诞生，在全县已形成县、区、村三级合作社系统，进一步发挥了支援抗战、发展生产、交流物资的作用。

为达到生产自救的目的，县联社曾提倡、组织、支持单位或个人兴办各项事业。首先组织农民开展家庭副业，发动妇女在家纺线、织袜子。清水、斋堂、东胡林、西胡林

等村，每村约有七、八户人家自制纺车纺线，除供应当地群众使用外，还供应军队。其次，贷款支持黄岭西开煤窑；贷款支持上清水杨连义、杜宏敏办抄纸厂；贷款二、三万元给上清水连久章，支持其烧缸……这样做，有力地促进了群众副业生产的发展。宛平县贸易局在梁家庄、西胡林村办了织布厂，后扩大到二、三十台织布机，三十多人，织出的土布交给晋察冀边区办的华兴公司进行分配。

与此同时积极开展购销活动，将收购的花椒、大柿子、核桃、杏仁等通过大安山、西苑村、柳林水运往京津地区，换回食盐、火柴、药品、纸张等商品。县联社每三天去根据地南城司赶一次集，从集市上或从那里的“巨兴隆”、“南城司贸易公司”等国营商店进货；亦到樊山堡、张家口等地去组织进货，把购进的大牲畜、布匹等商品售给各区或村合作社，供群众生产、生活所用。为解决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组建了医药合作社，收购的柴胡、大黄、远志等药材，一部分出售给外地，一部分自己加工成药丸。后来县联社调张国江大夫到药社工作，除为附近的干部群众治病外，并规定每月下乡一次，到较远的山村为群众治病。一九四五年以后，由于业务扩大，药社才在西斋堂村建立院址，后来发展到三十多人。他们下乡治病深受群众欢迎。

（四）县联社自从在秋林铺村建立之日起，曾先后迁徙到莲花庵、塔河、上清水、戒台寺、大台、西斋堂等八个地方；区办事处更是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人员调动也很频繁。抗日战争时期县、区、村三级合作社系统组织已初具规模。据不完全统计，在县联社领导下，已发展到有五个区办事处、约六十多个村合作社的局面，在支援抗战，解决军需民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解放战争时期合作社的巩固与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寇冲跨了的村合作社迅速恢复起来；在土改运动中又新建了一批村合作社；除六、七区为敌占区外，一区至五区较大的自然村均建立了合作社。一九四八年重建县社机构为“宛平县生产推进社”，一九四九年又改为“宛平县供销合作社”。

一九四四年，日寇从上清水撤退。敌人撤走的当天晚上，就恢复了村农会组织，开始了减租减息的斗争，清算了两家地主，并把没收地主的财产做了股金，军烈属、赤贫每人分两个股，为日寇做过事的人，根据具体情节，有的人分一个股，有的人不分股；同时买了三头骡子、两台弹花机、两台轧花机办起了合作社，经群众选举，郭永祥、连维军任合作社理事会理事，负责合作社的具体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王宏广同志去斋堂高小办合作社，并找了学生赵文达、陈文元做会计工作，又用股金从集市上买回棉花，供学生课余时间纺线、织袜子，然后再拿到集市上去卖。所得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给师生分红；其余的用于购买教学用具、抚养烈士子女、节假日时给学生改善伙食，达到以生产养学校的目的。此举可谓是勤工俭学的雏形。一九四七年七月，曹安有在西斋堂村办合作社，取名“公合永”，约有股金一千斤玉米，又借了三十万元边区票作为流动资金。固定资产有两头骡子：一头是新买的，一头是土改时分的。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他曾到易县华兴贸易公司赊购商品，卖完了再去付款。社员每三个月分一次红。

一九四五年，各机关为了改善生活纷纷办商店。县委机关办了“公聚永”商店；县政府机关办了“永合”商店；县公安局办了“光明”商店；专署办了“大有”商店等等。以上这些商店均属机关生产。县联社也随之改名为“民生”商店。原县联社主任杨国文继续任民生商店的经理，王喜朝、吕光印任业务股长，贾福齐任总会计。一九四六年杨国文调出，聘请谭成义当经理。当时，县联社共计四十多人，流动资金三万元左右，固定资产有两把骡子（每把四头骡子和一头骑驴），两辆胶皮粘轱大车，西斋堂、大安山还设有门市部。它的库存量约有二百匹布，一、二千斤食盐。一九四七年底，晋察冀边区行署批评机关办商店，遂下令撤销机关所有商店，都归属到“华兴”公司（华兴公司在解放后迁到北京城区）。宛平县联社也划归华兴公司。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县政府工商科和只有一个秘书的“合作委员会”代替县联社领导基层合作社的工作。工商科的科长先后是苗树堂、王振远。总之，这一时期合作社迅速发展。村合作社不仅数量增加，而且经济实力加强，为医治战争的创伤，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八年春，宛平县在察哈尔省政府领导下，成立了“宛平县生产推进社”。吕光印同志任生产推进社主任，宋连君任付主任，业务股股长杨兴昌，信贷部部长刘殿凯，会计股股长梁增阁，文书刘国庆，机关共二十多人。社址先后设在西胡林村、煤窝杨家村、西斋堂村。七个区都成立了办事处：一区（现清水以西）办事处主任依次为李文艺、杨寿文；二区（现沿河乡范围）办事处主任李青云；三区（斋堂、军响、煤窝、南北庄、黄岭西等）办事处主任杜宏敏；四区（周口店、大安山等地）办事处主任依次为陈显章、马玉铎；五区（大台地区）办事处主任李成凯；六区（里十三）负责人贾文立；七区（外十三、龙泉务）负责人彭德富。此时六、七区是敌占区，办事处人员住白道子、吕坡等地。生产推进社的任务是：推进农业生产，组织副业生产，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基层组织发展合作社，开展购销业务，做好生活、生产资料供应。

在支持发展农副业生产方面，推进社曾从解放区购进大牲畜，借贷给农民搞生产，大量收购木兰膏子，做黑色染料，而且在西胡林办了一个染房染布，供军需民用。五区李成凯等人在王平村办了合作煤矿，全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合作煤矿社员，直到一九五一年这个矿的人员、财产都交给了矿务局为止。

在购销活动方面，推进社有两把骡子，由王文玉赶着，经常到长辛店、南城司、大梁子等地去取货，同时也吸引敌占区的商人到根据地做买卖。当时合作社主要经营小农具、小百货等生产、生活用品，收购的农副产品通过城子转运站的关系，贴上“银花”（即税票）运销到北京。

信贷部负责代替银行发放农业贷款，奖励互助合作。

一九四八年底解放北平时，推进社派一批干部约二十多人参加支前委员会工作。他们住在长辛店，帮助采购军需用品。后因北平和平解放，大部分人回了原单位，小部分人随同进京工作。

生产推进社的成立使宛平县县级合作社机构重新恢复起来，推进了本县农副业生产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六月，宛平县划归河北省通县专区领导，生产推进社统一改名为供销合